

权力魅影背后的主体迷茫

——陈昌平《非生意关系》探析

刘 琳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金华 321004)

摘 要: 陈昌平的《非生意关系》, 围绕着人在权力欲求中的复杂纠葛, 展现了女性在以男性为主导的权力社会中于无可奈何中败退的无情现实, 揭示了权力魔杖下男女两性地位失衡的真实处境; 同时, 小说还反映了两性在权力较量中由征服与屈从的关系主体逐渐衍化为施虐与受虐的关系主体, 并在这种享虐性心理阴影的猖狂解构下陷入迷茫性存在境遇的社会图景和异化情境。

关键词: 《非生意关系》; 权力; 性别; 施虐; 受虐

中图分类号: I207.4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1)05-0092-05

The Subject Confusion behind the Power Phantom

——Comment on Non-Business Relationship by Chen Changping

LIU Lin

(School of Humanit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Zhejiang, 321004, China)

Abstract: “Non-business Relationship” written by Chen Changping is about people’s complex disputes in the power of desire, which is showing the women in male-dominated power society are in the merciless reality of helplessness and retreat, as well as revealing the real imbalance situation of the status of women and men under the magic wand of power. At the same time, the novel also reflects that both the sexes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quest and subordination are gradually derived for the main relationship between abusive and battered in the power contest, which is enjoying the psychological shadow of abuse. In this wild deconstruction, they fall into a confusing social situation and an alienation situation.

Key words: Non-Business Relationship; power; sexuality; abuse; masochism

陈昌平被称为“智慧型小说家”,^[1]其作品虽然数量不多,但都体现了他对社会人生冷静而凌厉的审视。中篇小说《非生意关系》以一个“位高权重的男性总经理”与一个“立志创业的女大学生”的故事,颠覆了人们惯常的审美想象,在真实而无奈的社会生活场景中,展现了权力魔杖统照下两性失衡的地位关系,以及权力欲求带来的享虐性心理阴影对人性本真的猖狂解构,引人深思。

一 权力与性别

陈昌平以往的小说,总是将笔触伸向特定的历史,在并不遥远的历史境遇中讲述某段记忆、某个故事或某些人,有时还会触及到某种宏大叙事,但他的笔触又很理性,总是力图跳出历史囿限,将目光聚焦在权力操控下个人命运的沉浮与挣扎中,比如《英雄》《汉奸》《国家机密》等,历史只是扶衬,但

收稿日期: 2011-05-13

作者简介: 刘琳(1986-),女,河南信阳人,浙江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又是人物命运变化必不可少的助推器。而到了《非生意关系》这里,历史这一背景帷幕被撤除,不再是具象的物理时间,个人与历史的纠葛也不再是作者探讨的重点。人物在行为面前的心理及潜意识纵身一跃抵达文章表意层面,权力成为人物命运的指挥棒,挟裹着身份地位悬殊的男女主人公,直指人物隐秘的内心世界和两性社会结构的纵深地带。

所谓权力,《现代汉语词典》上解释为“政治上的强制力量”和“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量”。^[2]从广义意义上讲,权力就是一种控制力和支配力,其表现形式呈现出一种征服与屈从的关系。马克思·韦伯曾从两性关系入手分析了权力与性别的关系,他指出:从历史到现在,两性之间的状况就是一种支配与从属的关系,无论性支配目前显得多么沉寂,它仍是我们文化中最普遍的思想意识,最根本的权力概念。^[3]而陈昌平的《非生意关系》,则从社会角度探讨了权力雾霭笼罩下的两性位置。

在传统的两性体制中,男权文化是社会机制的代表,具有绝对的领导权和话语操纵权,女性始终处于一种被父权和夫权所压制、奴役的弱势地位,身心都无自主性可言。社会发展到今天,在相关性别保障法律的实施以及女权主义者们的努力下,女性的地位已有极大改观,现代社会似乎为现代娜拉们提供了更宽松的条件。于是很多女性沿着娜拉的步伐,更加勇敢和自信地走出家庭,走向更广大的社会,刘虹和高燕就是众多娜拉后继者中的两位。她们一毕业就迫不及待地自主创业,渴望凭借自己的实力(知识)在社会上挣得立足之地。但是,她们很快就面临社会抛过来的一系列严峻考验。于是高燕退出,在“一个有实权的处长”姨夫的帮助下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而刘虹只能以向李禹寻求帮助的方式继续坚守自己的梦想。可以说,无论是高燕还是刘虹,尽管其选择不同,但旨归是一样的,即都背离了娜拉出走的初衷,走向了回归的道路。这种回归,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实是一种屈从——对社会的屈从。这就昭示着,她们虽然逃出了家庭权力的限制,却走入了一个更加密实的社会权利牢笼。

李禹之所以能够帮助刘虹顺利创业并令其事业蒸蒸日上,是因为他是一位身兼官职的商人,不仅有丰富的人脉资源,还手握权力。李禹给刘虹介绍的业务,既有商场上的合作关系,也有官场上的权力压制,而其动用的权力分量远远重于合作。刘

虹只是一个刚毕业的冲动女大学生,无容貌,无实力,无背景。这注定了李禹对刘虹居高临下的俯视态度和对她事业/命运的操纵,也正好暗合了传统社会中男强女弱、男尊女卑的两性关系和威权体制,只不过这种关系和体制从家庭挪到了社会。刘虹虽然摆脱了传统社会中女性被奴役的命运,却并未走出被操纵的地位,在李禹面前,她一直是被指挥的角色,个人在创业道路上的主体地位被排挤,甚至被抹煞。

如果说一开始,茫然无措又无知的刘虹是带着感激自愿接受李禹的帮助,那么随着作者对李禹和刘虹各自心理矛盾的一步展示,我们发现,李禹的目的似乎并不那么纯粹,作者的意旨和小说的所指也随之变得暧昧迷离。一方面,多年的职场和官场鏖战经历,历练出李禹圆滑而世故的行事准则,“在他的世界里,没有理由的行为,就是冲动,就是乱来,就是自掘坟墓。”但是,在帮助刘虹这件事上,如果说最初他还不知道想要的是什么,却清楚自己不要的是什么,那就是他帮助刘虹,绝不是因为对刘虹这个具有女性性别身份的人感兴趣。一开始,他就以自己特定的男性主体目光对刘虹的女性外貌进行了审视:身材矮胖,面孔扁平,单眼皮的小眼睛,灰黄的牙齿,甚至还有男人才有的一抹小胡子。李禹对刘虹容貌的挑剔,就是对他们情人关系潜在可能性的否定。可以说,在这个欲望肆虐的两性世界里,欠缺美貌的刘虹不仅不是男权文化视野乐于接受的夏娃,也不合乎性政治建构标准的女性气质。所以,《非生意关系》不仅自动背离了主流话语力图建构的清官神话,也颠覆了传统视域里建基于欲望/性爱基础之上的男女关系。另一方面,刘虹的事业渐渐步入正轨,而他对她的帮助也由指导渐渐变为指挥甚至是控制,刘虹慢慢丧失自主选择和自我运作的权力,甚至连自我申述的话语空间都没有。从“三大原则”到送礼被拒再到买车买房,几乎每件事都是在李禹强势的部署下进行,刘虹也开始感觉到:“与其说是领导对员工,还不如说是军官对士兵。”显然,无论是员工与领导,还是士兵与军官,都是一种被动的服从关系,后一关系与前者想比,更带有硬性的、不容置疑的筹码力度。而事实上,刘虹是法律上的自主创业者,这两种关系他们都不具备。

李禹曾多次思索自己无偿帮助刘虹的原因,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刘虹和她的事业是他辛苦而精心

培养的品种,“就像一株自己亲手栽种的果树……最有境界的是,即使硕果累累了,自己却军纪严明、秋毫不犯……也不能让别人玷污这个‘品种’。”对于刘虹的物质回报,李禹也坚决拒绝:“他知道自己不是圣贤,但是,现在的境界又确实靠近了圣贤……他现在就活在这种境界里”,并且,越是决绝,“这种境界就更显得高耸、丰满、充实和……他已经想到了伟大这样的词汇啦。”由此可见,李禹要帮助刘虹这个稚嫩的女学生创业,是想在一步步培养刘虹的过程中,一点点体会自己的权力带来的成就感和这一“无私”之举带来的崇高感。刘虹的创业基础越差,他的成就感越强;越不接受刘虹的丝毫回报,这种崇高感越纯粹。

在此,女性主义评论家盖尔·鲁宾对莱维史特劳士的血族体制理论进行解读时的“礼物”说也许能为我们提供阐释的契机。^[4]莱维史特劳士在其《血族关系的基本结构》中指出:在血族关系的形成中,由于“乱伦的禁忌”,女人被当做“礼物”以维系各种关系的交换。鲁宾就此分析道:礼物是社会交往的纽带,而女人是最好的礼物,在这种以交换女人建立起来的庞大的社会体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一种血族体系,这一体系确定了权利的关系;既然女人是礼物,那么男人可以主宰交易的进行,在交换的过程中,礼物的受益者必然是男性。也就是说,在社会体系(这个体系显然是由男性主导的)建立的过程中,女性的作用就是被当做“礼物”,成为男性交换或确立权力关系的工具。在《非生意关系》中,虽然刘虹与李禹非亲非故,李禹也无权让刘虹以婚姻的形式去交换什么,但是,李禹在打牌时第一次将刘虹介绍给余书记等人,就给刘虹安插了一个侄女的身份,交待是受人之托要照顾她。这时候,刘虹实际上就成为一种具有证明(确立)意义的“礼物”符号:不仅是李禹证明自己做人、为官之崇高、之伟大的“礼物”,也是证明男人之间权力/实力高下的“礼物”。所以当刘虹被胡总猥亵时,李禹“不能容忍”,甚至不惜“误伤友军”,当即亲自出面救刘虹于危难之中。

而对于涉世未深的刘虹来说,是不可能体会到李禹这一隐秘的快感的。她只知道自己事业上越成功,欠李禹的就越多,其自作主张的物质回报被拒绝后,就不知道如何是好了。于是,正如鲁宾进一步分析的那样,在社会的各种机构中,要成为交易方,就必须拿点什么来交换,而女性不能自主进

行交换,只能任凭男性摆布。如果说一开始刘虹敢于在座谈会上发出异质的声音,以及试图摆脱李禹,独立完成某项业务,都是对社会体系和以李禹为代表的渤海经济公司这些权力符号的公然反抗和颠覆,那么后来,随着这些反抗行为的失败,刘虹慢慢意识到,脱离了李禹的庇护和强大的权力关系网络,是很难闯出出路的,于是渐渐放弃与李禹(权力)的对峙,对其言听计从。无计可施的刘虹只能开始反省是不是错误出在自己身上。可悲的是,她自始至终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是被界定为一种关乎男性权力与地位的“礼物”,且不自觉地按照男性的期许,把自己内化成这样的“礼物”,试图以自己的处女之身相许,心甘情愿做李禹的二奶。刘虹的行为无疑暗示了女性在以男性为主导的权力社会中的柔弱以及所处的无可奈何的败退境地。

刘虹前后性格的转变,既有着传统性别、能力等观念的影响,也有着深刻的现实社会原因。作为一个男性作家,陈昌平也许无意于像很多女性小说作者那样,对女性性别这一政治话语做过多阐释,但他以一个男性的眼光所审视到的女性在权力社会面前的际遇和现实生活状态,冷酷却不失警醒。

二 权力与享虐

享虐,顾名思义,就是对虐待/被虐待行为的享受性心理现象,按照虐待的含义区分,其表现形式体现为施虐和受虐两种,而行为的主体则被称为施虐者和受虐者。有论者指出:施虐及受虐的表现正是对权力较量中征服与屈从关系的模拟,即享虐心理在本质上是对权力的欲求或是由于权力的缺乏,享虐行为则是对权力关系的模拟与复制,施虐行为带来的肉体暴力或精神暴力的背后总隐藏着由征服而产生的权力优越感。^[5]可见,享虐是权力关系的感性化,其要素之一就是权力结构中的统治与屈从的关系。而《非生意关系》中,李禹与刘虹正是这种关系的实践者,围绕着权力政治形成一种享虐关系。

1. 李禹:从权利的操纵者到精神上的施虐者。从公司老总到渤海地区的局级干部,李禹手中可谓是掌握了宽广而密集的权力关系,是实实在在的权力拥有者。刘虹的顺利创业和发展,显然是李禹间接动用权力运筹帷幄的结果。据前所述,位高权重的李禹对初创业者刘虹的帮助,并非是出于纯粹的乐善好施,而是为了在运用手中的权力帮助刘虹成

就事业的过程中,体会权力带来的成就感和优越感,并且把这一隐秘的心理当做是一种境界,每天温习、享受。因此,他坚决拒绝刘虹所有的回报。而对于不明真相又急于报答他的刘虹来说,这种冷漠的决绝无疑是一种心理折磨:“这个心病就是一个癌细胞,由于找不到妥善的治疗方案,已经开始扩散了、转移了。”显然,这时候,李禹已经在权力的携推下成为一个精神施虐者,而刘虹则充当了受虐的主体。

实际上,从李禹与刘虹开始有交集的那一刻起,刘虹就已经沦为李禹的享虐欲望的对象。座谈会上刘虹略带批判性质的揭露性发言,显示了她对以李禹为代表的(男性)权力体制的不服从,这无疑让习惯了被权力光环笼罩的李禹有一种被挑战的感觉。于是,如何重拾这种失却的被服从感以及由此带来的优越感,成为李禹帮助刘虹的一个极为隐秘(也许一开始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初衷。这种看似矛盾的行为,可以通过享虐心理学中施虐者的行为动机来解释:“施虐者通过对受虐者施加痛苦,并不纯粹是为了完成对本能的性唤起,而是要表明自己控制对方的权力。”^[6]亦即,通过帮助刘虹创业这一夹裹着“善意”外衣的行为,让刘虹不得不拜倒在其权利势力下并言听计从,从而达到控制和征服的目的。从小说的后文中我们可以看出,李禹正是在对刘虹的帮助/施虐过程中,以各种方式一步步对刘虹的言行进行控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指出:虐待症是一种试图对其他生命实施绝对控制的激情,其目标是控制、窒息生命的感觉,无助、无望、病弱的人会让虐待狂赶到兴奋。同时,对更强的人他又随时准备拜倒脚下。^{[7]322}因此,刘虹因公司面临窘境而向李禹求助时的弱小和无助,以及报答心切而送礼心愿未遂时的困惑与茫然,无疑都激发了李禹帮助/控制(施虐)她的心理;而当面对权利在自己之上的省长时,他又想尽一切办法取悦。

这种通过对权力的操控来进行施虐以满足一己之私欲的行为,实际上也是权力本身的一种表达和明确方式,隐含着施虐者强烈的自我主体意识和自我诉求。当这种主体意识或诉求遭到反抗而受挫时,施虐者就会心生不满或采取行动压制。刘虹在李禹不知情的情况下去做了整容,李禹对她容貌变化的反应却是:“这种变化不仅是他不需要的,而且是他警惕的,尤其是这种变化还是未经部署的、突然袭击的。”因而“愉快心情受到一点影响”,并间

接导致他后来愤怒情绪的爆发。

从权利的操纵者到精神上的施虐者,陈昌平以举重若轻的笔触一点点褪去李禹身上由权力光环包裹下的光鲜色彩,令其人性维度还原到最本真的状态。人性被权力泥淖浸染后的黑暗与复杂,也以刺目的样态展现在读者面前。

2. 刘虹:从被动的受虐者到权力的觊觎者。在位高权重的李禹面前,刘虹无疑是一个弱势者。李禹对其施行的精神虐待行为,对于刘虹来说,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不自知的过程。作为一个被动的受虐者,刘虹对李禹的“帮助”原由作出了多种猜测,但都以失败告终。稚嫩的她只能以自省/自虐的方式,企图从自我身上寻找谜底的突破口。

“女性从自我认同开始,走上了认识自己的过程。随着这一认识过程的深化,尤其是对女性自身心理缺陷的进一步挖掘,直接导致了一种女性内源性深重焦虑感的产生,这种难以化解的焦虑感在外在因素的刺激下,转变为一种‘自虐’的倾向,并在部分文本中转变为行为模式上的自我惩罚和自我救赎。”^[8]“受虐倾向是深层心理活动的一种方式。它的根源是想象,它的表达是隐喻,是灵魂的爱与痛苦的表达方式。”^[6]刘虹正是对此理论的实践者。在无法探察李禹的真实意图的情况下,她转向了对自我的认知和遐想,产生了以爱情来解释一切的念头。然而,镜子里前的刘虹让她对自己的容貌产生焦虑感,于是去整容。对于曾经连钻头在口腔里旋转都惧怕的她来说,承受和付出的代价可想而知。

这时候,刘虹就由一个不自知而被动的受虐者转化为自愿的受虐者,在这种受虐式的自我重塑过程中,继续沉浸在想象里。从“二奶”的想法到“老李”的称呼,再到把李禹的照片捂到胸口,刘虹的想象一步步精细化,李禹也渐渐蜕化为一个物体化的符号——由刘虹独有的物体符号。于是,二人的关系也在无形中被置换,刘虹成为李禹的拥有者/控制者,而李禹失却原来的主动地位,成为被统治者/屈从者。想象“调换了行为者的位置,一个人从受害者变为指导者和统治者;一个人的施虐者变为他的受害者。”^[9]亦即,现实中的权力结构在刘虹仪式性的“想象”中被颠覆。李禹无疑是权力的代表,而拥有了李禹就等于拥有了权利,也就是说,刘虹成为权力的拥有者,李禹成为她的服从者(图挽袖、递汤勺),于是,新的权利结构得以建立。李银河在她著名的《虐恋亚文化》中说:“彻底的屈从是为了得

到权力。从表面看,似乎再没有比这句话更自相矛盾的了,但它却是一些受虐者的逻辑。他通过自己彻底的降服得到对方的爱和关注,同时也就占有了对方,掌握了对方,控制了对方,使对方不能摆脱自己的束缚。表面上是受虐者受到施虐者的控制。因此,屈从者的真正动机乃是权力。事实上,在下者最终指挥一切。在上者也许是下意识地但却是不可避免地把他或他的游戏节目按照在下者的限度、愿望和要求来布置、安排。这好有一比,就是那个著名的政治上的屈从者甘地,他的目的是最终征服统治者。性的屈从也是为了攫取权力,并把权力定义为荒唐。”^[10]这一观点恰好契合了刘虹上述也许是无意识的想象之旅的隐秘性动机,即:刘虹对权力的觊觎欲望是显而易见的。

“受虐倾向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文化建构,一种占优势的家长式权力结构和产生性别差异的话语共同产生的主体地位。”^[11]对权力符号的追求导致了刘虹对自我和需求的错误认知,以及主体本真性和独立性的消解。从被动的受虐者到权力的觊觎者,刘虹也在自身的欲望诉求与权力运行机制之间,被强行抛入权力角逐游戏的虚无当中,丧失了最初的奋斗目标和动力。她以整容为代价自甘奔向二奶的选择,在某种方式上演绎了张爱玲的悲叹:“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也是最普遍的妇女职业。”^[12]虽然二者动机不同,结果却是一致的。对权力的觊觎,导致了她在人生选择上的迷失,也拉开了其最终悲剧性结局的黑色帷幕。

福柯曾言,四处弥散的权力,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理性一道嵌刻于各种话语和制度性场址之中。^{[7]326}陈昌平正是借助权力的魅影,将“官场内部的倾轧实况演变成复杂的世态图”,^[13]将依附于权力生存境遇背后的两性关系中的地位迷失,

以及人性被异化后的病态性心理表征,淋漓尽致地进行了呈现,这也正是《非生意关系》的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 [1] 洪治刚.幽暗深处的历史回响——评陈昌平的小说创作[J].当代作家评论,2004(6):85-90.
-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增补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048.
- [3] 凯特·米利特.性政治[M].宋文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33.
- [4] 胡政敏.“成功女性”坠入的陷阱[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3(6):55-58.
- [5] 王敏.享虐与权力:对文艺作品暴力现象的透析[J/OL].[2006-01-19].<http://www.studa.net/wenhuayanjiu/060119/17064292.html>.
- [6] 孔岩.虐恋与权力的迷思:从《钢琴教师》解读性政治[J].宁夏社会科学,2006(1):149-151.
- [7]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生命对你意味着什么[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3.
- [8] 袁林慧.抗争与救赎——对中国当代女性写作中“自恋”与“自虐”意识的解读[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高教版,2009(7):97-98.
- [9] 李瑾,王月.论张承志小说中的受虐现象[J].陕西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4):44-46.
- [10] 李银河.虐恋亚文化[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205.
- [11] 米兰达·许尔文.解构男性凝视[J].公冬青,译.世界电影,2008(6):1-15.
- [12] 张爱玲.谈女人[M]//张爱玲散文.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289.
- [13] 李红霞.烟尘弥漫的精神寻根之旅[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79-82.

责任编辑:黄声波